

# 台湾青年政治冷漠现象 及影响因素分析

吴乐杨

**摘要**：近年来台湾青年在政治态度上呈现出对政治问题冷漠的倾向，在政治行为上表现为对政治参与的疏远与逃避。台湾青年之所以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冷漠倾向，是有着深层次原因的。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台湾青年的政治冷漠倾向还将持续。

**关键词**：台湾青年；政治冷漠；政治参与；影响因素

## 一、理论内涵及问题提出

政治冷漠是指公民对政治活动冷淡和对政治问题漠视的政治态度及公民对政治参与疏远和逃避的政治行为<sup>[1]</sup>。罗伯特·A·达尔在解释“政治冷漠”现象时把社会人群分为有权者、谋求权力者、政治阶层和无政治阶层四大类<sup>[2]</sup>。在大多数的政治体系中，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和权力职位占有者都属少数，大多数公民缺乏政治热情。

当代台湾青年的政治冷漠现象，被媒体戏称为“票房毒药”。一般来说，20至30岁的台湾青年世代投票率比40至60岁的族群低15%；在历届选举中青年族群的投票率约30%左右。台湾的民调显示，“首投族”是选民中投票率最低的人群（所谓“首投族”，是指首次获得投票权的人群。按照台湾的选举制度规定，台湾居民年满20周岁除属于禁治产、曾犯贿选罪等之外，都将会自动获得投票权，不用进行选民登记）。台湾每年会增加约30至40万首次拥有投票权的年轻人，“首投族”成为台湾国、民两大政党必争之对象。2003年4月，台湾TVBS民调中心针对约160万“首投族”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首投族”表示不会去投票的比例占17%，高出一般选民约10%；“首投

族”表示一定会去投票的比例占49%，低于一般选民23%。根据台湾“内政部”统计资料，2012年台湾新增“首投族”120万人，若加上20至29岁人口，台湾的青年选民约346万人，是左右台湾选举结果的重要力量。

台湾青年是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未来力量，其心态是反映台湾社会变迁的风向标，正确认识这一群体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取向，对于把握台湾社会未来的政治心态及政治走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二、台湾青年政治冷漠现象的影响因素分析

1. 台湾当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及有效性相对不足

合法性一般是指被治者认为正当的或自愿承认的特性，它将政治权力的行使变成了“合法”的权威。合法性反映了一种认识上的一致，这种一致赋予领导者和国家以权威，合法性也反映了对个别领导者、机构和行为规范的尊重与承认<sup>[3]</sup>。政治科学家则通常从社会学角度来理解合法性，将其当成是依从某个统治系统的意愿，而不管该系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sup>[4]</sup>。合法性是维持政治体系稳定的基础。台湾当局的合法性建立在台湾民众的政治态度以及对台湾政



权的认同度和支持度之上,外在具体表现为台湾民众对自身利益、安全、自由、尊严等需求上的政治评价。

(1) 台湾民众政治认同危机损及了台湾执政当局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民众自认为“中国人”的比例逐年下降,自认为“台湾人”的比例不断上升,1994年“台湾人认同”比例超越“中国人认同”比例,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分裂已成为危及台湾政局稳定的主要根源,从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到公共政策,国家认同问题始终是台湾各派政治势力在政治斗争中无法回避的主题。《布莱克威尔政治社会学指南》一书指出,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之内“人们有各种不同的信仰,比方说,对他们应该属于哪一个国家有不同的看法”,就是政治统治合法性不足的明显例子<sup>[5]</sup>。台湾社会的政治认同迷乱,极大地损伤了台湾当局的统治合法性。亨廷顿指出,“在一个缺乏政治共同体感的政治落后的社会里,每个领袖、每个人、每个集团皆在追逐或被看作是在追逐自己眼前的物质目标,而置广泛的公益于不顾”<sup>[6]</sup>。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混乱,源于海峡两岸政治现实的结构矛盾及台湾政治各派势力进行权力斗争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政治过程中的政党斗争、族群撕裂及统独争议等乱象在社会中持续弥散,也在青年群体中造成了不好的印象,台湾政治体系合法性和领导人权威不断下降,台湾青年族群对民主制度和政府执政效能表示怀疑和失望。

(2) 台湾当局的政治体系回应能力与实际作为不佳

台湾进入民主体制以来,由于政党斗争导致政府运作效率不彰,集团利益分殊化及社会政治分裂导致内部政治体系的回应能力不高。亨廷顿认为,“太活跃的团体会妨碍统治者去做他们最有能力去做的事情,公共议事日程被扭曲了。不仅如此,高度自治化的团体还会导致过多的争论、分裂和不稳定。政治兴趣和政治积极性的骤然上升,可能预示着政治制度中的动乱或危机的到来,或新的严重分裂的出现”<sup>[7]</sup>。1986年国民党宣布“解严”以来,台湾社会走向多元化,从事利益综合的各种结构大量涌现,并逐渐介入台湾的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及公共政策。相对国民党威权体制时期而言,台湾当局的政治贯彻能力、社会环境适应力、政治系统控制力、政治体系创新力、

统治系统稳定性与统治方式有效性等皆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台湾当局在政治体系的实际作为上也成效不彰。在对外方面,台湾当局的国际活动空间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合理有效地解决;在对内方面,安全、福利、自由、经济发展等这些涉及人民生活品质的内部事务,也没有达到台湾民众的既有预期;在两岸关系政策上,台湾当局长期以来基本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

2. 台湾青年族群“政治效能感”及“政治信任感”普遍低下

(1) 台湾青年群体“政治效能感”一般较弱

政治效能感是反映和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政治态度变量。美国政治学者坎贝尔等人认为:“政治效能感是一种个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行动能够对于政治过程一定或能够产生影响的感觉,也是值得个人去实践其公民责任的感觉;也是公民感受到政治与社会的改变是可能的,而且可以在这种改变中起到一定作用的感觉”<sup>[8]</sup>。政治效能感与一个人政治介入的程度关系密切。个人的“政治效能感”低下就会损及公民卷入政治的热情。台湾青年政治效能感低下是受到台湾政治环境因素的影响。台湾社会的“金权政治”在“劣质选举文化”的推波助澜下,阻碍了台湾青年在政治过程中为自己发声的机会,青年族群普遍面临着政治参与的无力感及绝望感,他们不具备改变社会权力配置方式的能量,普遍漠视公共议题。民主政治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公民的素养,台湾青年一代缺乏成熟的社群精神与公民性格,台湾政治体制的发展成熟因而缺乏后续动力。

(2) 台湾青年世代的“政治信任感”普遍低下

政治信任感一般是指“对政府官员、政策、政治人物、政治现象、政治典则的信任态度”<sup>[9]</sup>。台湾青年逃避政治生活的重要原因源于对台湾政治和信任危机。2000至2008年民进党不合格的执政成绩单,让台湾青年的心一冷再冷。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贪腐行为、缺乏明确施政方向与两岸政策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台湾青年的挫折感、不安全感 and 信任危机。2007年台湾《天下杂志》所做的青年学生梦想大调查显示,近90%的受访青年学生认为社会不公平,约70%的受访者认为造成社会不公的主因是有权势的人玩弄法律及富人拥有较多的资源<sup>[10]</sup>。

台湾进入民主社会以来,台湾当局的执政无力及施政乱象增加了青年群体对政治生活的厌恶感,民主化则让他们看到了政治混乱的一面。青年人普遍对政



治生活和政治人物持怀疑态度,缺乏政治参与的动机。据报道,一位30多岁的理发师(台南人)在2012年台湾大选前夕向媒体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投过“总统”大选和立委选票,只有在自己亲人选里长时投了票,他说今年还是一样不会投,他觉得政治人物公信力太差,不管哪一党都一样,投不下去<sup>[11]</sup>。一位台湾大学生也表达了类似看法。2012年台湾地区“大选”投票前,台湾大学电机系一杨姓学生就表示不会去投票,并称对岛内政治生态认识不清晰,无法准确把握候选人政见及其政党背景,以至难于决断<sup>[12]</sup>。这也表明,一些台湾青年不具备进行复杂政治判断所需要的实际政治知识和经验。

### 3. 台湾青年生存压力影响及群体利益诉求的边缘化

#### (1) 台湾青年普遍贫困化及生存压力影响

由于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张,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青年大学生的失业率高居不下。根据台湾“教育部”统计,1996年台湾有24所大学、70所专科学校,大专以上毕业生人数将近19万名。至2010年,大学增为112所,为1996年的4.7倍,大专毕业生人数激增为31.5万人<sup>[13]</sup>。2000至2008年民进党执政期间,台湾经济走向衰落,人口失业率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下降。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不景气及产业萎缩,加剧了台湾青年的生存压力。

台湾的民调显示,青年群体对事关切身利益的就、住房、教育及其他公共民生政策的关注,明显多于空泛的政论性议题。在普遍贫困化及底层失落感的夹击下,如果从政治参与中得不到预期报酬,他们会提不起任何兴趣,他们在意的是切身利益和发展前景。2010年11月,代表绿党参选台北市议员的宋佳伦和李盈莹对媒体表示,“台湾社会青年贫穷的现状,已到达没有人可以自称中产阶级的时代,而对身处阶级‘底层’的年轻人而言,所有应当扮演起改善他们生活现状的机制都是失能的,教育导向负债、工作只能不同的派遣或低阶职位之间流浪,甫出校园的青年被债务追着跑,没有时间停顿也没有余地为自己找到一个‘好’工作”<sup>[14]</sup>。除了学业、求职烦恼外,台湾青年还面临感情婚姻、买房置产等问题,在生存重压下不愿参与不能带来直接收益的政治事务,是不难理解的。

#### (2) 台湾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未被充分关注

一个人介入政治的动机取决于对报酬价值的预

期。一般而言,政党主要使用特殊利益建立其拥护者及政党工作者的忠诚。台湾党政组织看中的只是青年人手中的选票,他们的利益和声音并不会得到政党组织的真正重视。政党候选人抛出的空洞承诺,并不能为青年人带来实际利益或发展机会,很难获得他们的认同和支持。2007年台湾《天下》杂志所做的青年学生梦想大调查显示,台湾青年对未来最忧虑的事情排名前三位的是:担心找不到好工作(约70%),处在一个没有正向价值的社会环境(约50%),找不到人生的方向(约30%)<sup>[15]</sup>。在现实压力的考验下,政治很难成为他们感兴趣的议题。2012年8月,《远见》杂志与EOLembrain东方快线市调公布“青年观点大调查”网络民调,询问年轻世代对人生、职场、婚姻等问题的想法与看法。结果显示,近60%受访青年表示生活中的最大压力来自财务,85%不满意目前薪资水平<sup>[16]</sup>。2003年台湾成立了“行政院青少年事务促进委员会”,但层级不高,影响也有限。由于国民党威权时代父权观念的影响,赢得选举的执政党也没有把青年发展问题放在应有的位置上。

### 4. 台湾青年世代“非权威化”的价值取向与自主意识凸显

#### (1) 台湾青年世代“反权威化”的价值取向

台湾青年在价值偏好上的“非权威化”倾向深受青年亚文化的影响。青年亚文化是指青少年持有的一套不同于成人社会的生活模式和文化形态。当代台湾多元的青年亚文化(如嘻哈亚文化、台客亚文化、物欲亚文化、动漫亚文化、网络亚文化及哈日亚文化等)生成在台湾特定的内外环境下,受到中华文化、台湾本土文化、美国文化及日本文化的影响,其特有的生活态度与“反权威化”的价值偏好,冲击和消解着台湾社会的主流政治文化与社会价值观。此外,台湾青年反权威主义价值观也受到台湾社会的抗争传统及其父辈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经验影响。前国民党中央组织发展委员会青年部主任刘灿树认为,“青年人的票不是靠收买的,应该要给青年一个希望,让他们感到这个社会有前景,有美好的未来,才能真正赢得青年的心”<sup>[17]</sup>。

#### (2) 台湾青年群体主体意识的凸显

长期以来,台湾年轻族群不仅政治冷漠,而且投票意愿很难掌握,参与政治的热度易于随具体情境及个人喜好而改变。因此,无论政党再怎么努力经



营,也不敢将青年选民视为铁票,大多将其归类为中间选民。达尔认为,“许多人认为介入政治的机会成本太高,不值得一试。这些人不愿放弃眼前的确定而具体的利益或源自非政治活动的满足,去获得可能随着政治参与而来的更为遥远、不确定和抽象的利益”<sup>[18]</sup>。

随着当代台湾青年族群生活形态的转变,他们关心婚前性行为远高于投票行为;关心网络世界远高于竞选文宣;关心演唱会远高于选举造势活动;关注生活质量远高于政治问题。2012年4月台湾《远见》杂志的一份关于民众幸福感的民调显示,台湾青年世代的幸福感失落比其他年龄层高,25至29岁的人过半数认为自己不幸福。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钮则认为,“年轻人觉得部分政治冷感,他关心的是,我什么时候能够存钱去买一支iphone?”“相较于中老年族群,首投族的投票倾向游移不定,可能依照爸妈的喜好投票,或者投票日当天约到喜欢的女生,前一天约会到太晚,隔天就不会出现在投票所”<sup>[19]</sup>。

### 5. 台湾政党组织力量衰落及主要政党竞选政纲的趋同化

#### (1) 台湾社会结构多元化与政党组织力量的衰落

台湾政党组织力量的衰落是造成台湾青年族群政治冷漠的重要原因。引起台湾政党组织逐渐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第一,随着公民社会的成熟和民间力量的强大,使得台湾政党组织的号召力和动员能力逐步削弱,政党力量下降;第二,台湾政党之间的争斗、政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斗争及政党与其他政治结构之间的角力,严重削弱了政党组织的社会基础,政党组织的生命力衰退;第三,台湾竞选文宣的产生、多样化和大量运用,既是政党组织力量进一步弱化的原因,也是政党组织力量衰退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台湾国民党内部发生重大分裂。1994年,国民党内“新国民党连线立委”出走后另组“新党”;2001年李登辉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后成立“台联党”,国民党的组织力量遭到重创。民进党的派系分化及斗争更为复杂,从宏观上可以分为党内务实派、温和派及基本教义派。民进党是党外一些团体联合创立的,其成立初期的派系即以这些团体为基础。1998年第四届“立委”选举后,民进党内共有福利国连线、正义连线、新潮流系、新世

纪办公室、新动力办公室及台独联盟等六个派系。2000年后,主导民进党的是正义连线、福利国连线和新潮流系等三大派系。以各自派系的利益为中心,民进党内的斗争主要围绕党的各级领导权的争夺、公职候选人党内提名的竞争、党的重大政策主张的分歧等形式展开。台湾政党体制及组织动员号召能力的衰退,导致了台湾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热情的下跌。

#### (2) 台湾青年党派意识淡化及主要政党竞选政纲的趋同化

政党政治的核心是选举,政党的首要目标是赢得选举。政党政治主导着台湾主要政党的政策走向。2008年台湾实现二次政党轮替后,台湾青年的党派意识呈现出逐步淡化的倾向,在对台湾内部、国际及两岸关系事务上,国民党及民进党的追随者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越来越小。早先为摆脱“外来政权”的称谓,随着本土化转型的完成,国民党在政策纲领与政治论述上逐步实现“台湾化”,其政策主张与民进党逐渐趋同化。为争取中间选民,国、民两党在竞选策略上都在向“中间路线”靠拢,主要政纲之间的差异性逐渐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参与过称中台湾青年面临的各项选择之间并无实质差异,即使不介入政治过程,对政治体系实际作为造成的影响并不大。

## 三、结 语

台湾青年的政治冷漠不仅引起了竞选过程中政党候选人与青年选民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大规模竞选造势及投票动员活动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此外,台湾地区“大选”所代表的民意基础普遍性不足,使得台湾的民主政治模式缺乏发展前景与后续动力,台湾当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因此大打折扣。

台湾青年社群广泛的政治冷漠,既是台湾政治制度软弱的表现,又是其政治制度软弱的根源。多元民主主义者认为,政治冷漠“意味着统治者没有将统治下的社会公民组织到政治活动中去,没有能力激起公民对政治的兴趣和对自己的忠诚。这种现象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当公民的大部分游离于正常的政治渠道之外,不能共同参与决定他们生活的决策时,这一国家的政治空气就变得具有潜在的爆发性”<sup>[20]</sup>。

为改变这种状况,台湾主要政党及社会各界想尽各种办法,成立了许多诱导、促进青年族群投票的组织 and 团体,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活动,试图动员青年积极投身到台湾的政治生活中去。从选举民调结果来看,

成效并不明显。

吴乐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珑玲

参考文献:

- [1]夏征农,陈至立.大辞海·政治学·社会学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18.  
[2][18][英]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王沪宁,陈峰.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30-152、134.  
[3][美]杰克·普拉诺.政治学分析词典[M].胡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82.  
[4][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M].吴勇.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34-35.  
[5][英]凯特·纳什,阿兰·斯科特.布莱克威尔政治社会学指南[M].李雪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13.  
[6][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北京:三联书店,1989.29.  
[7][20]潘小娟,张辰龙.当代西方政治学新词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421、422.  
[8]Angus Campbell, Gerald Gurin, Warren E. Miller. The Voter Decides[M]. Row, Peterson and Company, 1954:187.  
[9]林嘉诚,朱泓源.政治学词典[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283.  
[10][15]青年学生梦想大调查[J].(台湾)天下杂志,2007(384):102、105.  
[11]陈紫衣.青年选票动向不稳定 蓝绿抢破头[J].(台湾)新新闻,2011(1273):11.  
[12]王琮.蓝绿抢攻“首投族”[J].两岸关系,2011(5):20.  
[13]杜英仪.高等教育扩张与大学青年的失业问题[J].(台湾)经济前瞻,2011(9):41.  
[14]张铁志.绿党:环境政变、青年夺权[J].(台湾)新新闻,2010(1238):37.  
[16]财务令人喘不过气 85% 不满意目前薪资[J].远见杂志,2012(8):86-92.  
[17]黄英豪.台湾青年逐渐支持国民党[J].(香港)中国评论月刊,2003(6):57.  
[19]柯晓翔.抢青年选票“感觉”对了才有投票动力[J].(台湾)远见杂志,2011(12):78.

(上接第86页)

5. 从问题型思考向共识型思考的转变

在青年问题的学术研究中,我们长时间存在一个“问题——对策”式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将青年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往往是负面问题)一一罗列,然后根据这些问题寻找解决的对策。这种研究方式在青年工作中也有体现。这就是在工作中发现青年人的问题缺点,然后帮助他们克服解决。在当代,这种问题型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后喻文化时代,年长一代的困惑和傲慢。在米德看来,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后喻文化时代,即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和文化时代。年长一代的经验许多已经丧失了传喻的价值。而面对快速的变化,年长一代难以适应,趋于保守。而年轻人则适应这种变化,在其中自得其乐。这样代际之间产生差异和冲突。这里的意味是,当我们看到年轻一代的问题时,这些问题真的是青年人的问题,还是老一代难以适应时代变化的问题?在此,我

并不是要否认青年人有其自身的问题。我想要表达的是,我们不能在后喻文化时代,将这种问题型思考当成青年和青年工作的常态模式。在这个巨大变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缺乏应对一个如此迅速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经验。应该像米德要求的那样,通过代际之间的沟通交流,达成共识,共同面对各种挑战和问题。所以,青年研究应该是一种客观的、中立的研究;青年工作应该是追求达成共识的合作。

(本文系共青团中央2012-2013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一般课题“流行文化对农村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3YB155。)

刘怀光:河南师范大学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王志毅

参考文献:

- [1]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6.  
[2]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3]伯姆戴维.论对话[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0.  
[4]Lester M.Salamon.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J]. Foreign Affairs,73(4).